



# 古典文献 与古代小说理论研究

陈卫星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典文献与古代小说理论研究 / 陈卫星著. —北京：光  
明日报出版社，2009. 4

(鹅湖学术文丛)

ISBN 978 - 7 - 80206 - 564 - 2

I . 古… II . 陈… III .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3989 号

---

**鹅湖学术文丛·古典文献与古代小说理论研究**

---

**著    者：**陈卫星

---

**责任编辑：**茹新平                   **版式设计：**莘海琴

**责任校对：**徐为正                   **责任印制：**胡    骑 宋云鹏

---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 - 67078244

**传    真：**010 - 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mailto:gmcbs@gmw.cn)

---

**法律顾问：**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

**印    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2460 千字                   **印    张：**98

**版    次：**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06 - 564 - 2

---

**定    价：**280.00 元/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卫星将近几年撰写的论文结集出版,索序于我,我欣然答应了。因为这些论文,主要是卫星从我于桂子山读博期间所撰,也有部分是他在珞珈山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撰写的,我对他近几年的情况比较了解,由我来写序,可以向读者介绍他的成长进步及其学术路径,可能对读者阅读这些论文有所帮助。

记得2004年秋卫星开始读博时,对于学术研究不甚了了,甚至对如何撰写规范的学术论文也不大清楚。然而,他朴实敦厚,勤勉踏实,三年下来,不仅课程成绩优秀,发表了十来篇论文,博士学位论文也得到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肯定。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陈文新教授十分欣赏,收留他进站做博士后研究,进站后的表现也很优秀。卫星之所以在短短的四五年内,能够有这样的进步,除了他的刻苦努力而外,与他善于学习,找到了正确的学术路径是密切相关的。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人云亦云,不是学术研究。然而,创新之难,又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创新离不开新观念、新材料、新方法。没有新观念、新材料、新方法,就很难有真正严格意



义上的学术创新。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就是因为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结合出土的新材料，便开创出有别于传统学术的文学研究新纪元。例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将被传统学术排除在外的戏曲、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开辟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天地。胡适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研究《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等古代长篇通俗小说，使其真正具有了学术的品格，通俗小说也不再只是茶余饭后的闲书。而甲骨卜辞的发现诞生了“甲骨学”，敦煌文献的发现催生了“敦煌学”，流沙坠简的发现激活了“简帛学”，这些学术又反过来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学术方法是：“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对现代学术创新方法论的简练概括，其中包括了观念、材料、方法。在观念、材料、方法三者中，观念是指导性的、引领性的，方法是手段性的、工具性的，而材料则是原始性的、基础性的。做学问固然要讲求观念和方法，但更应该首先重视材料，夯实基础。没有扎实的材料做基础，再好的观念和方法也不会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高水平成果。当然，有了扎实的材料基础，又能够掌握新观念和新方法，那就如虎添翼，所向披靡了。

卫星读博之初，我和他商量确定的研究题目是“胡应麟的小说思想研究”，也向他谈到我的上述观点，希望他先不从思想观念入手，而是先踏踏实实做好材料基础工作。一是通读胡应麟的著作，扩展到读与他同时代人的著作及今人的研究著作，补充修订吴晗的《胡应麟年谱》；二是读胡应麟著作中提到的全部小说以及后人对这些小说的有关评论，做一本《胡应麟所读小说资料集解》。做好了这两件工作之后，再来思考和研究胡应麟的小说思想。卫星

按照这样的路径去读书、思考，不仅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学基础，而且还发现了一些前人未做研究或虽有研究但并未解决的问题，收入文集的《〈胡应麟年谱〉补正》、《〈诗薮〉撰年新证》、《胡应麟著述考》等，就是他在读书思考过程中的研究心得。这些心得以文献为依据，因而有较强说服力，推动了有关研究的深入。当然，仅仅做好材料工作是不够的，必须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学习新观念，掌握新方法，有敏锐的学术眼光，有创新的学术思维。20世纪的学术大师们有别于乾嘉学者的，就是他们借鉴了西方近代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有了与传统学术不同的新思维和新视角。因此，我要卫星去读一点西方的书，如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卡西尔的《人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以开拓思维，激活思想。卫星读得怎样，我不清楚，但他接受了我的还原历史语境、平等与古人对话的思想，也同意小说观念是随着小说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着的、胡应麟的小说思想只是中国古代小说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等观点，这便使他的研究抛弃了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而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故所论常常有新发现，绝非人云亦云。收入文集的《论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胡应麟的小说整理及小说创作》、《胡应麟小说虚实观刍议》、《小说观念与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构建》、《学说之别而非文体之分——〈汉志〉小说观探原》、《“五四”新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影响》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论文中的一些看法与我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却是卫星独立研究得到的结论，我也从中受到了启发。即使文中有的结论未必稳妥，有的方法未必得当，但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这种将材料与观念和方法有机结合的学术路径也是应该坚持的。我希望卫星能够继



续保持和发扬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又能将这种创新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也希望读者能够从这样的角度来读这些论文，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意见，以帮助他更快地成长进步。

是为序。

王齐洲

己丑惊蛰于华中师范大学寓所

# 目 录

序	王齐洲	1
《坛经》所载“九江驿”考释		1
《太平经》作者考		9
《诗薮》撰年新证		19
《胡应麟年谱》补正		27
《世说新语》书名考论		36
“内礼”还是“大礼”		
——《上博楚竹书(四)·内礼》篇题考辨		45
胡应麟著述考		53
胡应麟学术成就述论		61
小说观念与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构建		76
学说之别而非文体之分		
——《汉书·艺文志》小说观探原		84



“五四”新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影响 .....	96
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 .....	107
胡应麟的小说整理和小说创作 .....	130
胡应麟的小说虚实观刍议 .....	143
《少室山房笔丛》与鲁迅的古代小说研究 .....	155
胡应麟小说思想研究述评 .....	164
电影《画皮》(陈嘉上版)与《聊斋志异》情爱故事对比解读 .....	175
引领科举文化研究热潮 展示明代文学研究新貌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185
2007 年古代文学研究年度报告 .....	194
世俗化、庸俗化与当代中国佛教发展中的问题 .....	248
后 记 .....	265

## 《坛经》所载“九江驿”考释

**提 要:**《坛经》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经典,不仅全面反映了六祖惠能的禅宗思想,而且比较真实地记录了惠能入佛门、得真传,以及广弘佛法的经过。然《坛经》“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的记载,颇多疑义,多以为作伪而成。但是从九江和的黄梅历史沿革来看,唐代的所谓“九江驿”可能并不在江南而在江北,即今天湖北的黄梅县境内;《坛经》演变史上最早的古本之一《曹溪大师别传》的相关记载,亦可证实这一点。以“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的记载来证明《坛经》及相关史料的真伪,不足为据。

《坛经》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经典,在中国佛教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部经典不仅全面反映了六祖惠能的禅宗思想,也比较真实地记录了惠能入佛门、得真传,以及广弘佛法的经过。国内所见《坛经》最早的版本是敦煌写本(亦作法海本),该本大约成书于中唐时期,较为可靠,今所见各种整理本多以此本为底本。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坛经》的成书、流传、版本等问题仍存在不少疑点,故而对该书的内容也有不少质疑。



《坛经》载，六祖惠能三更受五祖弘忍传法衣，“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登时便悟。”<sup>①</sup>稍有地理常识的人就明白，五祖寺位于今湖北省黄梅县，九江则在江西省的九江市，两地长江阻隔，以过去的交通条件，从黄梅到九江绝非易事，至少需要较长时间。而且，从今天的地图上看来，五祖寺并不在长江边，从五祖寺到长江的直线距离近 50 公里，实际路程一定远大于这个距离。如果五祖送惠能一直送至九江，先走陆路再坐船走水路，则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又为当时的形势所不允：五祖深知，“自古传法，气（命）如悬丝”，传法惠能，则惠能随时有性命之虞，故五祖要惠能半夜三更悄悄离去，人不知鬼不觉。也就是说，五祖送惠能不会占用太长时间，也不可能太远，以避免事情的外泄。那么，“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当作何解？

中华书局 1983 年出版的《坛经校释》，所选底本精良，校释精当，是各种整理本中最为完备者，受到普遍欢迎，发行量已近四万册，亦为学界所重。对于“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校释》云：“从江北的湖北黄梅下山，到江南的江西九江，三更出发，当晚即到，这可能吗？！”<sup>②</sup>可见，《校释》对于“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非常不可信。其理由正如前所述。

《坛经》载：“五祖夜至三更，唤惠能堂内，说《金刚经》，惠能一闻，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法及衣：‘汝为六代祖。衣将为信稟，代代相传；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传法，气如悬丝！若信此间，有人害汝，汝即须速去。’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登时便悟。祖处分：‘汝去，

① （唐）法海集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8 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年版。

② （唐）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1 页。

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难去，在后弘法，善诱迷人，若得心开，汝悟无别。”辞违已了，便发向南。”<sup>①</sup>也就是说，《坛经》叙述此事，只说“三更发去”，并未载“当晚即到”。《坛经校释》此说也并非全无实据，因为关于此事《神会语录》就有过类似的记载：“忍大师谓曰：‘我自送汝。’其夜遂至九江驿，当时得船渡江。大师看过江，当夜却归至本山，众人并不知觉。”<sup>②</sup>然而，对于《神会语录》所叙述此事的真实性，《校释》认为：“……则弘忍不仅当晚送慧能到江边，而且还‘当夜却归至本山’。伪迹尤为显著！”<sup>③</sup>则不仅认为此事不可信，还将此作为《神会语录》是作伪而成的一条证据了。

如果从五祖寺出发，到长江边，再坐船渡江到对岸，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实在不是一件能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事。如果再算上返回时间，那么五祖弘忍是不可能做到“当夜却归至本山，众人并不知觉”。从这个意义上讲，《坛经校释》的怀疑不无道理。

然而，从九江和黄梅历史沿革来看，唐代的所谓“九江驿”可能并不在江南而在江北，即今天的黄梅县境内。

九江的地名，源于“刘歆以为湖汉九水（鄱水、余水、修水、豫章水、淦水、汎水、蜀水、南水、彭水）入彭蠡泽也”。<sup>④</sup>长江流经九江水域境内，与鄱阳湖和赣、鄂、皖三省毗连的河流汇集，水势浩淼，江面壮阔。故在汉代以前，九江是一个大的地域概念，包括了今天位于赣、鄂、皖三省边界长江与众多河流交汇的大片地区。《史记》

<sup>①</sup> (唐)法海集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河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

<sup>②</sup> (唐)神会：《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见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页。

<sup>③</sup> (唐)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页。

<sup>④</sup> (清)恽敬：《九江考》，见《大云山房文稿》(卷二)，四部丛刊本。



载，秦始皇一统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sup>①</sup>其中就有九江郡。关于当时九江郡的地盘，杜佑《通典》有过明确说明：“……春秋时属吴、越二国，越灭吴尽并其地，战国时属楚，秦并天下，置郡此为九江。今广陵、淮阴、钟离、寿春、永阳、历阳、庐江、同安、蕲春、弋阳、鄱阳、章郡、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郡是。”<sup>②</sup>汉代仍沿袭九江郡建制，所辖地域基本未变，但名称偶有变更，《汉书》卷二十八载：“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为淮南国，武帝元狩元年复故。莽曰延平。属扬州。”<sup>③</sup>

但自汉代以后，九江就较少作为地方建制名称，而多以江州代之，且所辖地域也有较大变化。这是因为，“（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有司奏，荆、扬二州疆土旷远，统理尤难，于是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城，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兴元年，分庐江之寻（浔）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浔）阳郡，属江州。”<sup>④</sup>隋代开始仍袭江州旧称，隋炀帝“大业三年（607），罢江州为九江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讨平林士弘，复置江州”。<sup>⑤</sup>

可以看出，秦所置“九江郡”，汉代基本沿袭旧置，至两晋辖域有较大变化，且以“江州”代替了“九江”之名。而隋、唐两朝，“九江郡”的名称仅仅出现过一次，即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时长不过短短十五年，其余时间均作“江州”。《隋书·地理志》载有九江郡的地名：“九江郡（原注：旧置江州）。统县二，户七千六百一十七。”但新、旧《唐书》均不载九江郡，只载“江

①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39页。

②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61页。

③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9页。

④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9页。

⑤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5页。

州”。

六祖惠能出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寂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显然，在慧能生活的年代，并不存在“九江”，而只有“江州”这一地名。查唐人李吉甫(758—814)所撰《元和郡县图志》，江州“管县三：浔阳、彭泽、都昌”(即今九江、彭泽、都昌)。境内著名的地名计有庐山、巢湖故城、柴桑故城、半洲故城、官亭湖神庙、马当山、江水、彭蠡湖、钓矶山、彭泽故城、左里故城。<sup>①</sup>既无“九江”郡县之名存在，也无以“九江”命名的名胜，怎会有“九江驿”？再查蕲州所辖黄梅县，其著名的地名中，有“九江故城”，并载：“在县西南七十里。汉九江王黥布所筑。”<sup>②</sup>前已述及，在汉以前，九江是一个较大的地名，辖“今(指唐代一引者)广陵、淮阴、钟离、寿春、永阳、历阳、庐江、同安、蕲春、弋阳、鄱阳、章郡、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郡”，<sup>③</sup>即今天江苏的部分地区(广陵、淮阴主要是今天江苏的扬州、淮安一带)、安徽的西部和南部(钟离、寿春、永阳、历阳、庐江、同安主要是今天安徽的凤阳、寿县、滁州、和县、舒城、潜山一带)、湖北黄冈的主要部分(古蕲春郡，即蕲州，辖蕲春、黄梅、蕲水、广济四县，即今天湖北黄冈的蕲春、黄梅、浠水、武穴四县市)和江西的主要部分(弋阳、鄱阳、章郡、临川、庐陵、南康、宜春主要是今天江西的弋阳、鄱阳、南昌、抚州、吉安、南康、宜春一带)，所以汉九江王黥布在黄梅筑“九江城”并无不妥。关于“九江驿”，较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九江驿”就在黄梅的“九江故城”，“在县西南七十里”。但驿站为何不在县城，亦不名作“黄梅驿”，而冠以一个故城之名？《旧唐书》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驿凡一千六百三十

<sup>①</sup>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5页。

<sup>②</sup>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5页。

<sup>③</sup>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61页。



九。”<sup>①</sup>《新唐书》也说：“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sup>②</sup>足见当时邮驿事业之盛和驿站之多。黄梅以一县之域，东西、南北相距均近百里，以三十里计，则境内肯定有数个驿站，那么以著名的故城来命名当地的一个驿站自然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那么，从地理和历史沿革与《坛经》所载故事所发生的时间相对照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坛经》所载“九江驿”，在江北的黄梅，而非江南的“江州”（九江）。也就是说，五祖弘忍连夜送五祖离开，只是送到位于江北黄梅的“九江驿”，而并未渡江送到江南的“江州”。根据当时的危险境况，五祖送六祖只至江北，而未渡江，更符合情理。

其实，《神会语录》所说“其夜遂至九江驿，当时得船渡江”，以及“大师（弘忍）看过江”，其实正好充分说明九江驿在江北的黄梅，而非江南的江州（今九江）。可见，《坛经》“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是一种真实的记载，并无疑义。

《曹溪大师别传》是《坛经》演变史上最早的古本之一，由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和尚于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抄写带回日本，国内无传本。据书内传法悬记（预言）：“我灭度七十年后”，以及“大师……先天二年壬子岁灭度，至唐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云云，此书大约作于慧能寂灭后七十年，即建中二年（781）左右，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曹溪大师别传》这样叙述五祖送惠能：“忍大师告能曰：‘汝速去，吾当相送。’随至蕲州九江驿。忍大师告能曰……能遂礼辞南行。”<sup>③</sup>唐代蕲州辖四县，黄梅为其

<sup>①</sup>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36页。

<sup>②</sup>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98页。

<sup>③</sup> 佚名：《曹溪大师别传》，见《卍续藏》（第一四六册），（日本）京都藏经书院，1905—1912年，第121页。

中之一,《坛经》中亦载有“我于蕲州黄梅县东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之语。《曹溪大师别传》明确表述为五祖送慧能“至蕲州九江驿”,实非偶然。

可惜的是,唐代驿站非常之多,黄梅县在地理上也非重要区域,故位于黄梅西南部长江边的区区一个小驿站不易引人注意,并未在历史上留下更多记载。而明代撤江州复置九江府,九江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远远超过黄梅,且自明以后,九江作为地名基本没有改变。因此,对“九江驿”心存疑虑,或认为“九江驿”就在今九江市境内,也在所难免。但以此推断历史事件或甄别史料真伪,则可能难避郢书燕说之嫌。

五祖于九江驿送走惠能后,是否能像《神会语录》里所说,能“当夜却归至本山,众人并不知觉”?如以今天的地理形态来看,从五祖寺到长江边,直线距离近50公里,实际路程更远,当夜来回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清光绪二年(1876)版《黄梅县志》(是年为丙子年,亦作《丙子县志》)称:“(长)江水自广济垅坪下入黄梅界,旧绕蔡山,故山有古江心寺,后积鸿脑洲,江流遂往洲外,蔡山之江渐淤,而江遂三分,至封廓洲复合为一,其势皆由北而南。”<sup>①</sup>“积鸿脑洲”和“封廓洲”今已难觅旧迹,但“蔡山”犹存。蔡山正北方向是一个比较大的太白湖,稍东北方向是杨柳湖,再往东北是更大的龙感湖,长江汊道“旧绕蔡山”,则所谓“蔡山之江”极有可能是由“太白湖—杨柳湖—龙感湖”所连成的长江汊道。从五祖寺到“太白湖—杨柳湖—龙感湖”一线,直线距离则缩短了近五分之三,大约不到20公里。如果是这样,五祖弘忍从五祖寺送惠能到长江(“蔡山之江”)边,当夜返回,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么,将“大师看过江,当夜却归至本山,众人并不知觉”,作为《神会语录》的一处“伪迹”,

<sup>①</sup> 黄梅县人民政府:《黄梅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也有失偏颇。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和较早的佛教典籍可以证实，五祖弘忍只在江北的“九江驿”送惠能，并没有将其送过江去。但比法海本《坛经》晚出的惠昕本载此事却说（契嵩本、宗宝本亦类似）：“五祖相送，直至九江驿，有一只船子，五祖令慧能上船，五祖把橹自摇，惠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橹。’五祖言：‘只合是吾度汝，不可汝却度吾，无有是处。’惠能言：‘弟子迷时，和尚须度，今吾悟矣，过江摇橹，合是弟子度之。度名虽一，用处不同。……’五祖言：‘如是如是。……’。”<sup>①</sup>这种说法，一方面是受到了“九江驿”这一名称的迷惑，另一方面是为了阐发宗教义理，进行了一些加工和改造，是不能全作真事来看待的。胡适认为，“惠昕本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sup>②</sup>以惠昕本及其以后的版本中五祖送慧能的描述来看，胡氏此论或非虚言。

（载《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① （唐）慧能著，郭朋导读：《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80页。

② 胡适：《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见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315页。

## 《太平经》作者考

**提 要：**《太平经》是我国道教早期重要经典。关于《太平经》的作者问题，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难以找到有力的证明材料，学界较少言及。对于《太平经》作者，历代典籍中虽较少明言，但并非全无线索。概而言之，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干吉和宫崇，一种认为是帛和，一种认为它“是一部集体编写的道书”。通过考证两个“帛和”与干吉的关系，可以肯定两“帛和”均不可能是《太平经》的作者。“集体编写”之说也不能成立。可以认为干吉就是《太平经》的真正作者。

成书于汉代的《太平经》，是我国道教早期重要经典。通过研究《太平经》，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原始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可以对当时社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今存《太平经》稍完备者仅有明朝《道藏》残存五十七卷。今人王明《太平经合校》“根据《太平经钞》及其它二十七种引书加以校、补、附、存，基本上恢复一百七十卷的面貌”，<sup>①</sup>学界才得以窥见原书之概貌。

<sup>①</sup>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 页（《前言》）。